

多重现代性:跨文化视角

黄平

在社会学的传统里,自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对现代性的反思,一直都在进行,到今天也远远没有完成,就如现代性本身也远远没有完成一样,而且,这个“没有完成”,并不止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

而在中国,对现代性的反思其实是姗姗来迟的,因为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主要是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看作是一个如何追赶(catching-up)问题,因而对于现代性本身,即使有反思,也无非主要是怎样避免走弯路的问题,却比较少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张力去考虑如何超越一元(例如西方的)或一纬(例如制度的)的现代性的问题。

如今,谈到现代性的多元(多样、多重、多纬),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最近过世的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在他的晚年对于这个问题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我们今天讨论多重现代性,无论如何应该记住他的贡献,并在他的研究和论述基础上往前走、往深走。¹

艾森斯塔德不同意他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假说,艾氏认为,冷战结束后,与其说我们将迎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不如说随着现代性的扩展和深化,将会不可避免地遭遇现代性的冲突,因为现代性本身包含着多重性。

长话短说,现代性,不只是哈贝马斯所谓的“未完成的工程”(unfinished project),更是一个开放的过程(open program);现代性,不只要从制度的角度加以认识,也要从文化的角度加以阐释,甚至还要从性别、族群的角度,生态的角度,等等,等等,去加以理解;现代性,不只是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不只西方(欧美)的,也是非西方的,其中,不只有如今正在日益被人意识到---包括以欣赏的眼光和以怀疑、警惕乃至敌视的眼光意识到---的亚洲(日本、中国、印度等)的现代性,也有非洲的、拉美的现代性,甚至还有中东的、伊斯兰的现代性。

所以,现代性,不只是多元的(即多纬度的 multiple),也是多样的(即复数的 modernities)。在此意义上,“后现代”决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性之后”,中国、亚洲或非西方的现代性,也决不只是如何在形式和数量上追赶(西方),更不只是(西方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之下的特殊个案乃至例外。

拿中国---虽然,绝不只是中国---来说,经过近现代以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和变革,中国已经在实践的层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提出了另类的可能。中国作为一个有如此漫长的历史延续、如此丰厚的文化沉淀,又有如此广阔的地域、如此众多的人口,特别又经历过几十年的革命洗礼和建设探索,最近这30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对300年来似乎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提出了冲击,而且,这个冲击,并不只是在“(西方)普遍 vs (中国)特殊”的知识框架下产生的地区性展开或区域性现象,也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说现代性还应该包含着(除了经济以

¹ Daedalus, vol.1, winter, 2000

外) 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维度, 或者, 在“现代性”前面是否还应该也带有“中国特色”之类的前缀、修饰。

我自己在近 20 年来的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或重建的研究过程中, 提出过一个“大胆”的问题: 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地理综合体, 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式的现代化这种方式来组织? 这种组织方式再“成功”(如果把所有的殖民、掠夺、侵略、战争和对生态的破坏都忽略不计的话!), 也就是在很有限的人群和很有限的地域里搞了三-五百年, 但是, 人类社会有文字的历史已经几千年了, 各种文明形态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走下来, 有的是消失了, 但是有的还在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发展着, 延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它们的历史要悠久得多, 覆盖的地域要广得多, 涉及的人群要多得多, 它们的道路和“模式”要多得多, 其所能够提供的解释也应该丰富得多。这也才符合**任何科学最基本的假设: 任何一种东西, 如果它所覆盖的地域越广、跨越的时间越长、涉及的对象越多, 那么, 很可能, 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大。**²

如果这个类似科学的句子的逻辑是成立的, 那么, 关于中国(以及广大的非西方世界)是否也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这些道路(和“模式”)是否仅仅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本来就根本不是问题。或者说, 对于西方的道路和“模式”的反思, 本来也不是什么问题。

上面之所以说是“很可能”, 绝不是谦虚, 而是因为, 即使是很小的地域和很短的时间, 也未必就一定不能滋生出后来被证明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比如小如古代雅典者, 后来被我们熟知并崇奉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 就是从这里孕育出来的。这个当然也得看后来怎样发展了, 并不一定都能如此“个性中有共性”, 多数情况往往正好相反, 无非过眼烟云而已, 早就被人遗忘了。当然最具有反讽意味的——也最值得深思的——是, 如今世界上经济、科技、教育、军事最强大的国家, 一方面坚持自己是个“例外”(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另一方面却坚信自己代表了普世的准则, 因此是全世界的当然领袖。

中国的现代性, 或者说, 中国的发展道路, 背后最大的意义之一, 是它所依据的, 并不只是西方意义上的作为单一个人的“自我”(individual self, 这是西方现代性最核心的概念!), 而是不断由近及远、由我及他、由少及多的自我化过程, 其边界从来是不确定的, 或者, 更准确地说, 不固定的。出发点就不只是作为个人的我, 而也可以是包括着这个我的家、族、群、团、队、社、村, 更可以是勾连着这些我、家、族、群、团、队、社、村的关系、网络。其最大的特点, 借费孝通的概念, 就是某种“差序格局”(这个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恰当的英文对应词!), 而我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式的自我, 是一个不断伸延并拓展的过程(an incremental expansion of selves)。这, 大概是我们理解并阐释中国道路(或者, 所谓“中国模式”?)的关键, 也是中国式现代性之所以能提供另类可能的关键。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只是以古希腊原子论为基础的个人为出发点或者“基本分析单位”, 或者, 仅仅由单个人出发去算计投入-产出、效益-成本, 中国的江南早就应该破产不知多少次了, 怎么可能在所谓农业生产不断过密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条件下还能孕育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样的东西来? 后来, 又怎么可能在 1970 年代江南一带率先搞出了乡村企业和后来的个体工商业? 如今, 怎么可能中国的江南今天居然是发展最强劲的城市乡村一体化地带? 小到江南, 大到中国, 如果按照单个人为出发点的认识论、方法论, 很难解释过去的历史, 也很难解释今天的现实, 还很难预测今后的发展。如果一

² 黄平: “重建社区公共性”, 《中国经济》, 2010. 3, 第 110-125 页。

定要解释，也就基本是“历史如此黑暗、今天仍然专制、未来必然倒塌”这类自我安慰性质的老调陈辞。

回到多重现代性上来看，如果在艾森斯塔德之后，我们不需要再要论现代性究竟是不是多纬多样的，那么，自艾柯等以来，现代性就更需要不断超越自己，跨越原有的文化屏障，不管自己原有的文化多么丰富、多么令自己骄傲、多么令他人羡慕。

所以，“跨文化”，不只是地理或空间意义上跨越各种阻隔的交流和对话（cross-cultural dialogues），尽管这一点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成立就提倡却至今还做得太少太少；跨文化，更是对现有的文化的超越（trans-cultural），无论其多么伟大，因为，自己的文化越是伟大，反而越难超越，越容易对自我文化优越、对他人文化歧视。但是，如果现代性本身是多纬多样多重的，就不得不意识到，跨越出自己文化的屏障，才能看到这些“多”，并从这些“多”（但不是杂！）中看到未来的开放性，以及——甚至更重要的——各个地区和民族的人们在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情境下自己不断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可能性和人类走向和谐、正义和审美的正当性。